

# 從「心」到「腦」

## ——現代中國思想主體的語言建構

● 陳建華

要理解二十世紀中國，「革命」無疑是個關鍵詞，這得追溯到二十世紀初。當時梁啟超高談「革命」，對於其意識形態的形成扮演了重要角色，這方面筆者在《「革命」的現代性：中國革命話語考論》一書中有所論述<sup>①</sup>。假定我們問梁啟超為甚麼如此醉心「革命」？他或許會回答是因為他的「腦子」特別靈。不信這裏舉二個例子。如1899年《壯別》一詩：「赤手鑄新腦，雷音殄古魔」。他以盧梭(Jean-Jacques Rousseau)、孟德斯鳩(Charles de Montesquieu)自居，以改造國民靈魂為己任，當然他自己已擁有「新腦」了。1901年在《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》一詩中說：「眼底駢羅世界政俗之同異，腦中孕含廿紀思想之瑰奇」<sup>②</sup>，可見他這個「新腦」似乎特別神奇。梁氏聲言「革命」是從日本翻譯借來的，含有和平變革的新義；其實他所使用的「腦」也含有新義，已在社會上流行了。

「腦」字古已有之，但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門戶開放後，和「革命」一樣，其詞義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發生迅速而巨大的變化，一個最基本的變化是「腦」取代了「心」而成為主宰思維的器官，是產生思想的地方。今天我們

的日常使用裏，「腦子」是「思想」的代詞，仍受惠於一個多世紀以前的遺產。雖然不像「革命」對社會造成那麼大的影響，但「腦」關乎我們的思維主體，是製造中國現代思想的大本營。如果「革命」是個傀儡，「腦」就是在背後牽線的，弔詭的是當梁啟超驚呼暴力「革命」深入人心時，說明不管他的「新腦」怎麼靈光，其魔力也有一定的限度。

「心」一向是管思維的。《孟子》說：「心之官則思」，這一直到王陽明「心學」，並無疑問。「腦」處於頭顱的致命部位，顯然至關重要，雖有「主腦」等用法，但與思維、記憶的功能沒甚麼關係。翻開《漢語大辭典》「心」的條目：「古代以心為思維器官，故沿用為腦的代稱」<sup>③</sup>，已指出這一點。這似乎已是老生常談，但本文想簡單談談這個取代的過程，可見「腦」這個指符流走無端，最初還戴着上帝的光環，挾持着西學，跨越不同的知識領域，從神學、醫學到文學，從人體、思維、視覺到記憶，不斷加入新的科技如攝影與電影的元素。在這一語言建構之旅中活躍着新的思想動力與想像活力，衍生出新的詞語，又與傳統

文化遭遇、斡旋與融合，構成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。

這得從十七世紀談起。何小蓮在《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》一書中指出，明末西洋傳教士來中土傳教，帶來的西學包含人體解剖的知識，如利瑪竇 (Matteo Ricci) 在解釋神學的「靈性」問題時，論及人的記憶。《西國記法·原本篇》云：「記含之室在腦囊，蓋顱囟後枕骨下，為記含之室，故人追憶所記之事驟不可得，其手不覺搔腦後，若索物令之出着，雖兒童亦如是，或人腦後有患則多遺忘。」即以空間比喻形象地說明人腦的位置與記憶的功用，這是當時解剖學中的精華部分<sup>④</sup>。漢學家史景遷 (Jonathan D. Spence) 著有《利瑪竇的記憶之宮》(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) 一書<sup>⑤</sup>，表彰利瑪竇傳播「記含之室」的貢獻，也含有他的腦子特別靈的意思。這一新說和傳統的以「心」為主的理論相抵觸，因此只在士大夫和醫生小圈子當中傳播，並未被普遍接受。

傳教士合信 (Benjamin Hobson) 撰於1851年的《全體新論》一書系統介紹西醫解剖學，產生深刻影響。書中宣稱上帝是萬物之主，而人腦乃其統攝機關，「蓋人性之靈，存乎腦也」<sup>⑥</sup>。腦不僅主宰靈魂，也掌管周身血脈骨肉，所謂「凡人之魂，居於頭腦之中，靈妙無質，藉周身腦氣筋以運其用」<sup>⑦</sup>。書中又解釋「所謂腦氣筋者，其義有二：一取其源由腦出，二取其主司動作覺悟」<sup>⑧</sup>。

「腦氣筋」一詞現在沒人用了，但對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來說魅力十足。其時西學大舉東漸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為強勢的知識話語。傳教士相繼創辦各種期刊或畫刊，多具「新聞紙」性質，標舉「格致」傳播西學，密切配合中國現實，如在報導中外新聞時，強調先進與落後之

對照，實即蘊涵其推進改革的企劃。其影響最著者當數林樂知 (Young J. Allen) 主編的《萬國公報》，從1874年起歷時三十餘年，對維新變法運動直接產生作用。這大家都知道，但其前身《教會新報》在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方面已作了大量工作。除了丁韋良 (W. A. P. Martin) 的《格物入門》、艾約瑟 (Joseph Edkins) 的《格致新學提綱》之外，尤其是刊於1873至74年間韋廉臣 (Alexander Williamson) 的《格物探源》，系統闡述了從宇宙生成、天文地理到人體結構等科學知識，儘管歸原於上帝的創始，也帶來了當時西方流行的「人即機器」的理論，對於禮崩樂壞的中國別具一種吸引力。如《論腦》曰<sup>⑨</sup>：

今電學之出也如此其艱，功用如此其鉅，究不知此事早具於吾人之身。自有生民以來，無一人之體非此電氣之流動者。電報之銅線，在人即為腦氣筋。各國之都會，在人即為腦。都會之總電路，在人即為脊髓。總路之旁出小路，在人即凡腦氣筋之路。總路旁之城垣驛站，在人即周身之百節。腦氣筋分布全體，無體不有其質。

這裏把合信《全體新論》中「腦氣筋」的概念加以發揮，新鮮有趣地把血脈貫通的生命機體比作「電氣」和「都會」，這是相當機靈的宣傳策略。當時在上海，電燈、電報、電話等相繼出現，市民因而驚喜，當然也更為服膺西來的物質文明。此後「腦氣筋」分精英與通俗兩途繼續流播。在精英層面上，至少到十九世紀末像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一般崇尚西學的，無不深受傳教士著述的影響，雖然口裏不怎麼說。在梁的言論中，「腦氣」、「腦力」、「腦蒂」的話頭已是不少。最虔誠的莫過於譚嗣同了，在《仁學》中

試圖用「仁」、「以太」、「靈魂」作為核心概念來重建形而上體系，像是糅合儒佛耶的拼盤，但其中「以太」非同小可：「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，於人身為腦。……其分布於四肢及周身之皮膚曰腦氣筋……腦為有形質之電，是電必為無形質之腦。」<sup>⑩</sup>所謂與「電力」、「靈魂」、「體魄」相通的「腦氣筋」，幾乎完全從韋廉臣《格物探源》那裏轉述過來，只是略加發揮而已。

通俗傳播管道包括報紙副刊、消閒雜誌等，以筆記、小說或廣告的形式出現，功效有時要比精英話語大得多。1872年《申報》創辦後附送《瀛寰瑣紀》，是為文藝副刊之濫觴。有小吉羅庵主的〈人身生機靈機論〉一文說：「靈機者宅於腦宮，由腦宮以偏於一身。有細筋兩類：一以身外之各情呈之於腦，一以傳令於四體百骸者也。」<sup>⑪</sup>內容取自《全體新論》，只是經過一番消化。或者像1876年傳教士傅蘭雅 (John Fryer) 主編的《格致彙編》上刊登的〈睡能補腦力〉的短文：「蓋每思念一事，必費腦質若干，而腦之質全恃血以補之，偌不睡則補工難成。」<sup>⑫</sup>這裏僅傳達一個簡單的道理，腦子像一架機器，受了損耗就需要修復或補充，睡眠屬於一種自然的能量轉換。後來把廣告做得鋪天蓋地的「艾羅補腦汁」或者「韋廉士補血健腦」，就是根據這種能量轉換的原理。早在1904年《時報》上刊出「艾羅補腦汁」的廣告：「腦為一身之主，其腦氣筋纏繞周身四肢百髓」，「若腦血少，精神氣力頹然疲矣」<sup>⑬</sup>。

二十世紀初，「腦」已確立其主宰思想的權威地位。1902年孫寶瑄在《忘山廬日記》中說：「人但能勤用腦思，何理不能明，何法不能精，何事不能成？歐洲人能開立今日之新世界，何以非從人之腦思中發現者耶？」<sup>⑭</sup>這頗

能反映一般讀書人的看法，如果中國有這樣的「腦思」就好了。的確，中國人自從甲午之恥後立志要洗心革腦，有「腦」方能及「思」，首先使「腦」舊瓶裝新酒。這一思想主體話語的重構逐漸顯出其本土化特徵，「上帝」不提了，或代之以「天運」、「生機」等。在「物競天擇」的全球格局裏，腦子要足夠堅固方能保證思想的生產，應當像「機器」一樣，而傳統的「心」過於肉感脆弱，自然被淘汰了，但不至於完全消失，仍有「心思」、「心想」之類的表述，其功能基本上被限定在情感的範圍之內。

到民國初期，在精英方面「腦」話語沒多大發明，而在都市通俗文學那裏卻大放異彩。1910年代中期《遊戲雜誌》、《禮拜六》等消閒刊物風起雲湧，言情、哀情小說盛行一時，自然在描寫才子佳人一見鍾情、兩相思念時，腦子就活動起來，如1914年包天

**上海總發行所 三馬路中法老藥房經理**

艾羅補腦汁功用錄

腦氣筋纏繞週身圖

腦底生九對

脊髓

左右生腦

氣筋廿一對

腦為一身之主，其腦氣筋纏繞周身四肢百髓，若腦血少，精神氣力頹然疲矣。

此藥能補腦力，治一切腦病，如頭暈、眼花、耳鳴、腰酸、背痛、手足麻木、失眠、健忘、神經衰弱、小兒發育不全、婦女經期不調、產後失血過多、病後體弱、老人衰弱、一切虛損之症，服之立見奇效。每瓶一元，大瓶二元。

1904年《時報》上的「艾羅補腦汁」廣告

笑《電話》：「日間瞥見君顏，深映我之腦髓胸臆中」<sup>⑮</sup>。1915年周瘦鵑譯《妻之心》：「瑪山爾自昨日與白蘭子把臂後，心頭猶覺溫馨，而亭亭之影，似已由巴黎名雕刻家深鉸於其腦蒂之上，不能或忘。」<sup>⑯</sup>本來利瑪竇的「記含之室」已把腦子當做儲存記憶的載體，於是衍生出許多「腦海」、「腦宮」、「腦府」之類的空間表述，而在包、周的描寫裏，「腦髓」、「腦蒂」能保存並投射出影像，這就跟舶來的照相、電影等視覺傳媒有關。

這些作家大多醉心於照相、電影這類玩意兒，他們的描述與現代視覺技術裝置相結合，使腦子更像個攝影機。其中「腦」與「目」的關係早已在韋廉臣的《格物探源》有清楚論述：「五官之用，舉為奇妙，愈究而愈微奧，其尤奇者，更莫如目，靈魂欲睹萬象，須資乎牖，目乃其牖也。」<sup>⑰</sup>靈魂必須通過眼睛的窗戶才能看到外界萬象，因此眼睛特別重要，居五官之冠。在1915年劍嘯的小說《君亦吸枝雪茄否？》中，當敘述者看到一對男女時：「不知我目光甚銳，這一幅並肩的影片，早已攝在腦筋裏邊。」<sup>⑱</sup>在1913年吳雙熱的「哀情小說」《孽冤鏡》中有一段更具體：「腦海起特殊之感觸，眼光表無上之歡迎。……一線情絲，倩視線為代表，從而更高捲眼簾，視神經起快鏡作用，攝此春色，留痕於網膜之上。」<sup>⑲</sup>這段描寫揭示了感知結構的歷史變化狀況，如「視神經」、「網膜」來自解剖學中有關「目」的語彙，和「快鏡」、「攝此春色」所含的照相機械原理相結合。

周瘦鵑是最早熱心介紹電影文化者之一，筆者在別處介紹過<sup>⑳</sup>。在他1917年的中篇小說《紅顏知己》中，有描繪主人公錢一塵如何思念他的夢中情人的一段，把腦子、記憶與電影聯繫在一起<sup>㉑</sup>：

有時擱筆靜坐，只消把眼兒一閉，腦兒裏就立刻作怪起來。瞬時影戲開場了，那在上海所經的一切事，好似都攝成了影戲片，一張張連續的演着，末後便演到那荒田中的事。電力既足，片子自然也清楚。當時原在黑夜，沒有瞧見那美人兒的芳容。不知怎樣，這影片中卻現出個月明花豔的絕世美人來。珠香玉笑，栩栩如活。贈針一段，益發做得生動。加着這影戲，並不是尋常的影戲，且還是哀迭生發明的有聲影戲。一壁搖着影戲機，一壁又開着留聲機，眼兒注在那雪白的布幕上，耳中還聽得一串珠圓玉潤，鶯嬌燕脆的妙聲，委實和那夜所聽的一模一樣，並沒一絲變動。

把腦子比作電影院，來自於周氏的觀影經驗。從1914年起他常去當時由西人經營的電影院，並把看過的影片譯寫成「影戲小說」在《禮拜六》等雜誌上發表。上面這一段回憶猶如電影鏡頭在腦中展現。原先在半夜裏，一塵沒見到這位「絕世美人」的面容，而這裏不知從哪裏來的「電力」，照亮了他的幻想，於是出現在熒幕上。比起把腦子比作攝影機的描寫，這裏加上電影放映機、布幕、電力、留聲機等技術機件，那就更複雜了。到後來藉電影來回憶與心上人的愛戀之情，幾乎成為文學中的俗套，如陸小曼1925年的日記裏描述思念徐志摩：「再無聊時耽着思想，做不到的事情，得不着的快樂，只要能閉着眼睛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眼前飛過也是快樂的，至少也能得着片刻的安慰。」<sup>㉒</sup>

特別在吳雙熱、周瘦鵑等人的文言小說裏，古典抒情文學的資源被大量運用。本來中國文學裏關於「夢」、「影」、「幻」、「憶」的心理表現極其豐富，到晚明以來更趨於複雜。當他們在腦子的思維空間裏展開心理活動

時，原先和「心」相連的種種修辭技巧也陳倉暗渡，因此在「心」與「腦」之間產生傳統與現代的遭遇。這裏限於篇幅，就不舉例了。

數典不必忘祖，「腦」既指涉思想主體，對於研究中國現代思想來說，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。近年來視覺研究成為顯學，有的學者以魯迅的「幻燈片事件」為例，認為是「中國現代文學的視覺技術化之源」<sup>②</sup>，筆者以為是一種本末倒置的說法。圍繞「腦」的語言建構是十九世紀末、二十世紀初的歷史階段的現象，其材料是大量的，值得作深入探索。然而對於這一歷史過程的考察，一般「觀念史」的方法難以奏效，而需要置於一種「感知史」或「文化史」的視域之中，打通不同學科與領域及雅俗之間的界限。這樣一個自我改造主體的集體工程，為何不約而同地朝「現代化」的方向走？其間又受到哪種集體無意識的驅動？這會觸及更多的問題。筆者藉這篇短文略陳管見，祈正於方家。

### 註釋

① 陳建華：《「革命」的現代性：中國革命話語考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）。

② 梁啟超：〈汗漫錄·壯別二十六首〉，《清議報》，第36冊（1900年2月）；〈贈別鄭秋蕃兼謝惠書〉，《清議報》，第84冊（1901年7月）。

③ 漢語大辭典編輯委員會編：《漢語大辭典》，第三冊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、武漢：湖北辭書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2267。

④ 何小蓮：《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20-39。

⑤ Jonathan D. Spence, *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* (New York: Penguin Books, 1985).

⑥⑦⑧ 合信 (Benjamin Hobson)：《全體新論》（廣州：惠愛醫館，1851），頁36b；79b；1a。

⑨ 韋廉臣 (Alexander Williamson)：〈格物探源·論腦第十九〉，《教會新報》（台北：華文書局，原刊印影本，1968），頁2465。

⑩ 蔡尚思、方行編：《譚嗣同全集》，增訂本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，頁292。

⑪ 小吉羅庵主：〈人身生機靈機論〉，《瀛寰瑣紀》，卷二（1872年11月），頁3a。

⑫ 〈睡能補腦力〉，《格致彙編》，第1年第10卷（1876年11月），頁13a。

⑬ 「艾羅補腦汁」廣告，參見《時報》，第155期（1904年11月13日），第2張，第5頁。

⑭ 孫寶瑄：《忘山廬日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591，陰曆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五日日記。

⑮ 包天笑：〈電話〉，《中華小說界》，第1期（1914年1月），頁6。

⑯ 毛亨著，周瘦鵑譯：〈妻之心〉，引自胡寄塵編：《小說名畫大觀》，第一冊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316。

⑰ 韋廉臣 (Alexander Williamson)：〈格物探源·論目第二十〉，《教會新報》，頁2478。

⑱ 劍嘯：〈君亦吸枝雪茄否？〉，《禮拜六》，第47期（1915年4月），頁31。

⑲ 吳雙熱著，于潤琦整理：《孽冤鏡》（哈爾濱：北方文藝出版社，1997），頁16。

⑳ 陳建華：〈中國電影的先驅——周瘦鵑《影戲話》讀解〉，載《從革命到共和——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、電影與文化的轉型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205-36。

㉑ 周瘦鵑：《紅顏知己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17），頁63-64。

㉒ 參見柴草編：《陸小曼詩文》（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34。

㉓ Rey Chow, *Primitive Passions: Visuality, Sexuality, Ethnography,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5), 16.